

# 中国青年应如何面对历史

科目：与“历史”对话

考核方式：读书报告

姓名：杨子豪

学号：2041XXXX

联系电话：XXXXXXXX

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站在现处的时间节点上，对过去人类活动进程的回溯。面向历史，与历史“对话”，可以让我们“以史明智”。这一被众多哲学家、史学家所赞同的观点，其深层逻辑是将历史作为对当下时代的映射，而非与现实的割裂，以期在历史中借鉴可为今用的处世、治世之道。谈之回溯、研读历史，历史观就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模式。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由于对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关系认识不同，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史学观念——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之所以被逐渐取代，是因为其与封建王权、神权统治之间存在纽带联系，其根本思想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这种根本思想的影响下，唯心主义历史观便会造成以“神权、君权至上”的错误观念。同时，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清，还会导致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度推崇，以及对群众力量的忽视。而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通过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洞察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原历史原貌。谈此两者，是为了厘清历史观对于如何面对历史的重要性，而下文读书报告中所涉及的历史观，更多是侧重学者、当代青年以何种观念看待历史，不过多在定义中着笔。

本文希望在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读书报告为载体，

辩证探讨学者提出的一些看待历史的观念，厘清中国青年应以何种史观、态度面对历史。对于选书方面，将此两本著述一同分析，是因不少学者认为黄仁宇之论述没有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而对其有所批判，让人联想到钱穆先生书中提到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通过两者的差异对比，笔者希望中国青年既能做到跳离自己所处时代背景，客观分析历史事件当时的得与失，又能回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用现代视角审视历史症结，以期古为今用。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围绕万历皇帝统治第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对七位不同领域的历史人物——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申行时、万历皇帝、文官海瑞、将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进行历史研究。黄先生运用“大历史观”的视角，以期论证此书开篇中提到的1587年，虽表面上四海生平，无事可记，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sup>①</sup>。所谓“大历史观”是其提出的一种史学观念，此处之“大”，不仅是史料体量大，更是强调应将十年百年的历史光影缩为一瞬，置于时间长河的波澜起伏之中，摸索隐藏在王侯将相剪影下历史的真正脉络。除了以长时段看历史，他还在大历史观中融入了对社会组织结构与群众运动的透视和对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归纳。例如，书中提及臣民对慈圣太后的隆重追悼，是为了通过礼教在社会中渲染更为强烈的阶级关系，加强民众对皇室的忠悃，从而稳固社会的组织结构。这些观点并非黄仁宇首创，如司马迁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长时段的强

---

<sup>①</sup>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调，又或如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亦有对社会结构与群众运动的强调。但不可否认，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将这些整理、综合应用，仍为描写明代万历十五年提供了新颖视角。

《万历十五年》在内容方面，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位人物在明代走向没落中的无力感。他们深感时代症结，却被政治的惯性所束缚，1587年如同囚牢般枷锁他们的肉体与精神。黄先生理解的此症结之根源，便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以道德、礼义代替法制的社会习惯，于明代至其顶峰。此种道德约束，忽视了官员在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却仍有难以调和的“阴”面，即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这些私欲在缺乏法律的约束时，滋生于光鲜亮丽的道德穹幕之后。此书视角下的万历皇帝，如同傀儡一般作为全国的道德规范，只能遵循儒家死板的道德仪式，甚至出皇城都成为奢望。究其原因，可归结于多数大臣想要的不是一个有所建树、有所创新的皇帝，而是一个被儒家道德伦理完全架空的皇帝。万历在张居正的教导下，幼时尚以积极态度对待国事、礼仪，对官员腐化深表忧虑时，仍会草拟手诏禁止互赠礼物。然而，立储无法随自己心意后，他意识到官员和自己都有道德与私欲的两重性，“阴”的一面无法被调和，于是，他以完全的“罢工”消极回应文官系统，即虽不强迫官员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对官员对他的要求做出回应。这足可见万历皇帝在此环境下无一天可享受自由意识的无奈。

当我们将视线转到民族英雄戚继光身上，仍深感悲痛与惋惜。戚继光利用政治才能和谭纶、张居正的赏识，在蓟州推行他的军备改革，

在对倭寇一战中展尽锋芒。但这种锋芒与文官所遵循的“平衡原则”大相径庭，文官们认为“戚家军”不是对国家的保护，带有个人色彩的军队是对政权的威胁。在张居正去世后一年里，他精神忧郁，主动辞职，生命最后几年的时光坠入了凄凉与孤寂。大厦将倾之际，无论是功绩卓著的戚继光，抑或是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都无法在僵化的政治体制中做到“力挽狂澜于既倒”。黄先生将历史事件放入时间长河中，对其进行接近细致的因果分析，这也许是我们青年可以借鉴的。此观念有助于我们长时段、深层次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对问题有更辩证、求根溯源的分析，而非肤浅、人云亦云式的盲从。以此为基础，青年才能成为对国家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的思考者、行动者。

然而，有很多史学家对《万历十五年》中对明代进步性的忽视提出质疑。陈梧桐教授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以论代史，这会降低史料的客观性，因为仅取所需的论述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经众多学者考究，《万历十五年》中存在许多对史料断章取义式的用法，这与尽可能还原历史原貌的研究准则相悖。<sup>①</sup>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对李贽的描写中。读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笔者直观感受到的是黄先生对李贽偏向否定的情绪，认为李贽仅具有理智上对社会的同情心，却没有创新的意识和改变的勇气，似乎缺少对其思想上卓越贡献的肯定。陈教授认为黄仁宇受西方“中国停滞论”影响过甚，对明朝历史有全盘否定的偏颇，没有客观评析历史人物的功绩，仅聚焦其失败的时刻，即认

---

<sup>①</sup> 参见陈梧桐：《黄仁宇的明史观错误——质疑〈万历十五年〉》，2020年10月11日，[https://www.sohu.com/a/423971698\\_692685](https://www.sohu.com/a/423971698_692685)，2022年3月20日。

为黄仁宇没有客观看待这一朝代，忽略了明朝虽然政治走向僵化、经济上却走向活跃的特点。<sup>①</sup>

此类争论涉及较深，笔者虽然作为一名理工学生，未有机会对双方论述做出细致史料核对与研究，但此类“全盘否认文化、历史”的现象，在历史中并不少见，一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特殊时代条件下的“全盘否定”之缘由。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展开了对传统文化全面的批驳，但研读他们前期著作，不难发现他们自己是可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优势的。但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仍然尖锐指出“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sup>②</sup>。在西方文艺复兴中，其实也存在对历史的过度否定，这导致过分强调人的自由与价值，从而使骄奢淫逸的行为普遍发生。于此两者，笔者认为，在特殊时代，人们往往会采取矫枉过正的手段试图解决根植已久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处于儒学僵化、社会腐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在西方神学宗教统治下黑暗的中世纪，他们都急需变革，此时，为了根治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普通的呼吁已经无法唤醒麻木的人群，他们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只得寻找如此偏激的方法——即对过去所有文化、历史的全盘否定。此类事件也证明开头中所提，历史并非与现实割裂，通过这种对历史的特殊批判，亦能达到对当下社会的影响。从陈梧桐对《万历十五年》的批驳、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这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对历史的分析都深

---

<sup>①</sup> 详见陈梧桐：《黄仁宇的明史观错误——质疑〈万历十五年〉》，2020年10月11日，[https://www.sohu.com/a/423971698\\_692685](https://www.sohu.com/a/423971698_692685)，2022年3月20日。

<sup>②</sup>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受自己时代的影响。

谈到时代环境对历史分析的影响，可参考的另一本书籍便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其面对历史时，明显区别于以上三者，而将重点放在“历史意见”上。钱穆将事件发生时本代人对于此事出自当时实际影响的评价定义为“历史意见”；而后世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环境与需要，对于历史制度、经济、文化的分析，称为“时代意见”，即时代对研究历史的影响。<sup>①</sup>时代意见并非不可取，但却不能以时代意见抹杀历史意见。站在当下立场，以时代意见看皇权专制，我们会看见皇权专制的弊端，认为它是不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而以历史意见，皇权专制的诞生代表着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顺应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即便它在后期确实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换句话说，历史事物前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后期僵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抹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唐代兵役制度的解读为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领会钱穆对待历史的态度。钱穆以汉唐兵役制度差异起笔，点出汉代兵役制度是“寓兵于民”，而唐代兵役制度是“寓民于兵”，即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随后钱穆又分析“寓民于兵”的制度优势，即能在保证全国四十万到八十万军队训练较为有素的同时，又不需费一粒米养兵，而且武官虽立功封勋，但有勋无职，无法干预政事。基于这种兵役制度，唐朝在统治全国的同时得以不断向外发展。之后，钱穆又分析了此制度衰败的

---

<sup>①</sup>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3页。

原因，指出“人事”是重要因素：一是苦差事向军队借兵帮忙，导致士兵成为苦役，受人轻贱；二是中央犯了懒惰病，忽视了对阵亡士兵家属的抚恤。这两大原因使百姓逃亡规避当兵，从而导致处于强盛时期的唐代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统治力，为后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爆发埋下了祸患。读过此节，笔者不禁赞叹钱穆先生的文笔深厚、脉络清晰，这不光体现在钱穆先生对史料的透彻分析，还体现在其深扎历史意见，注重制度沿革，结合唐代的历史背景对兵役制度的变迁与兴衰做出深入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万历十五年》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做的简要的读书报告，其中《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谈及较少，主要起辅助作用。回顾文章稍显繁琐的论证，简短总结，阅读这两本书，对中国青年应如何面对历史应有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古为今用，青年面对历史时应期待在历史中找到与现实的关联，以史为鉴，同时也应明白先人在特殊时代条件下，对历史全盘否定的深层逻辑；其二，学会以长时段面对历史，在长时段中感受历史事件中的逻辑关联，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其三，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既要做到带有时代性的见解，又不可让其抹杀“历史意见”，二者需相辅相成。以上便是笔者读书之所悟，望能牢记于心，将此应用至下次与历史的“对话”。

## 创作小记

我很少进行这种长篇写作，但通过这次写作，我对三件事情感悟尤深，想借此机会分享于可能看到这篇碎碎念的人。

首先，我想谈一下创作中的逻辑与思想的深度。我感受到的逻辑难题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怎么让句子、段落之间读起来更加顺承，以至使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像个整体；二是怎样顺着逻辑，逐渐让自己的思想更深邃，而非浮于表面。谈之逻辑，也许很多人直接想到的是因果、并列等常见逻辑类型，但真正创作时，逻辑更加体现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的联想过程。在这种网状结构里，要试图找到最有价值的那根主线，然后抛弃一些冗杂的分支，让读者更易理解。在我这个文章里，所找到的逻辑主线就是通过探讨两本书对“应以何种视角看历史”这一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深入自己的看法。逻辑深入的过程我认为亦是探索自己内心的过程，思考中不仅加深了对历史的洞见，更看清了自己对世事的认知。

其次，在准备文章的过程中，我在历史中寻到了血肉。在宏大的历史事件背后，该被看见的不仅是王侯将相的成败，亦是每个人作为芸芸众生的悲喜。悲百姓流离中哭尽离殇，悲家妻对将军相思不得见，悲大臣含冤赴死只留忠骨，亦悲末代皇帝一生爱被束缚；喜普通人家终得一生安康，亦喜英雄饮酒笑谈壮志成。在时间长河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无数普通人滚烫的热血，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构建起我们口中的恢宏历史。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欢喜，是因相似的情绪、



相似的历史也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的肌肤与血肉也逐渐溶于历史，即便我们大多数会是被遗忘在历史中的普通人。

最后，我想谈关于我们每次写作的读者。在现有阶段，我们的文笔风格和文章内容都被固定读者所限制，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不仅是中国文化课论文，亦是大学里写的每一篇 essay，如果取得高分是写作的目的之一，那么就需要迎合评改老师的喜好。而摸清一个固定读者群体的喜好，实则是一件痛苦而困难的事情，尤其对于 essay 来讲。所以如果我们想获得高分，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抛却内心的抵触与偏执，尝试在已有写作风格上，接受、融入读者的要求。而对于一些想要或需要长期写作的人，我由衷期待你们能摆脱这种“读者限制”，而摆脱这种限制的第一步，便是有能力将自己的文章让范围更广、更多样化的读者群体看到。让自己的文章能够被喜欢的群体选择，而非迎合固有读者，或许是走进真正创作的关键一步。虽然我厌烦有“读者限制”的写作练习，但我认为如想达到此种目标，这种练习仍是必不可少的。